

第二章 徐媛生平概述

成就一個詩人絕非輕易可及，更何況要在以男性為主角的傳統中國歷史上成就一位「女性」詩人，則更是不容易。放眼中國文學史，名字留在史冊上的女性文人，除了漢代班昭、蔡文姬，宋代李易安、朱淑真，實在很難再有其他的女作家可以擠進男性主導主筆的文學之林，直到明代末年，在江南出現數量不少的一批女作家，讓女性的聲音逐漸壯大，也讓女性在浩瀚的文學領域裡有發聲的機會，徐媛就是明末時期江南地區一位重要的女作家。是怎樣的時代背景或生活環境，讓明末的江南出現此等蓬勃發展的女性文學，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章將由明末時期江南地區的社會環境分析，漸次縮小範圍到徐媛家族的生活背景，再拼湊出徐媛的生命歷程。

第一節：明末江南的社會經濟與社會風尚

隨著城市自由經濟的發展日趨重要，讓晚明的江南成為中國歷史上別具特色的地區，脫離傳統以行政中心為主體的城市，江南在經濟力不斷強化與增強下，吐露了城市發展的新氣息。¹因城市化和商品化而增值的財富與晚明江南才女文化發展有著相輔相成的關係，隨著都市文化的發展、坊刻出版的繁榮、俗文學與娛樂事業的逐漸興盛，婦女也逐漸得以受教育、讀書、寫作、出版、旅行……，讓晚明的江南成為孕育婦女作家的搖籃²，而豐富多樣的社會生活更讓江南的才女們生活體驗不斷擴大，豐富了她們的閱歷與感動，更拓展了她們文學領域的觸

¹ 見王淑芬：〈明末清初蘇州城經濟與社會結構初探〉，《思與言》，（台北：思與言雜誌社 1995年1月 33卷第一期）頁46。

² 此論點參照高彥頤：《閩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一章，頁29-71。

角。蘇州城更因種種優勢的環境，成為江南地區的商品集散中心和工商業的中心，因此，在這個繁華熱鬧的蘇州城，成就了多元而豐富的文化。

南方的農業因氣候適合農業發展，每年可有二收，所以產量相對高出北方許多，在桑麻棉米的產量上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夏稅徵收絹的一次紀錄為例，南方比北方多了一十四萬零二百四十七疋，幾乎超出北方二倍之多。³明末萬曆六年(1578)秋糧米的徵收，南方米比北方米多了八百一十三萬九千一百九十四石，是北方的一倍以上。從秋糧米的徵收數據裡，可以看出明代產米的農業經濟中心是在南方，而南方的中心是在蘇、松(松江)、常(常州)三府。⁴而農業產量豐富的蘇州正是徐媛生長的地方。

因為桑棉的經濟價值高，除了豐富的產量提升了人們的經濟生活，週邊工作如採桑、織布、縫紉、刺繡等的經濟收入亦高，甚至成了家庭中主要的經濟來源。江南盛產的農作物與織品需要運送至北方的行政中心，所以交通運輸也十分重要。江南有長江、太湖、運河三大水系，再透過水運支線，可以將商品運銷往更多地方。蘇州與運河聯繫的水路，交會在閘門附近，⁵成為商賈、官員及漕運軍民必經之地；此外還有蘇州不收門攤商稅，這種原因便造成此地的高度經濟發展。因為經濟能力大大提升，讓城市中的風氣與社會產生了一些異於傳統的變化，例如基礎產業的改變、物質生活豐富造成娛樂事業的勃興，以及社會階級的流動等。

明末江南是資本主義初萌芽的時期，因為棉桑產量的富足，造成了下游手工業的興盛，例如紡織、縫紉、刺繡等，而這些工作大部分都可以獲得較好的收入，且幾乎由女性擔任，因此女性勞工的勞力所得，甚至高出男性勞力的工作所得，這提高了婦女在生產勞動中的地位，成為家庭中養家的重要人力，另外，因為家庭中的經濟來源較多，改善了家庭的物質生活，因此也多了一些空閒的時間，女性較被允許擁有屬於自己的交際圈，並在閒暇時間從事一些休閒的活動。大量勤

³見吳緝華：《明代社會經濟史論叢》，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0年9月，頁424。

⁴見吳緝華：《明代社會經濟史論叢》，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0年9月，頁425。

⁵據吳智琪：《徐燦及其作品研究》指出：閘門位蘇州城西，徐燦一家世居蘇州城西，可見徐媛應也是居住於閘門附近。

勞的勞動女性促進了江南經濟的活絡，讓居於上層階級的女性更有餘裕從事「不事生產」的活動，如踏青旅遊、賞花逛街、聽戲唱歌、識字受教育、甚至是閱讀寫作。所以，城市的興起，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間接的影響了女性的生活型態，讓明末江南的女性比起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代，多了些自由與活動的空間。

城市的興起也讓人民對於財富的看法有所改變，富人極盡奢華之能事，在日常生活的休閒娛樂中附庸風雅吟詩論文，婚喪喜慶的習俗裡表現也表現出對佳餚的崇尚，服裝造型上更打破太祖的階級規定，模仿官員、命婦、世人的服飾，⁶鬆動了原本嚴密的社會階級；而士人對於財富的看法，也不再是「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而在現實環境中不自覺的向財富靠攏，不再以追求財富為恥，加上江南明末的成功商人往往與士子有良好的聯繫，而且對於文學藝術也大多站在支持的立場，富商們在商品獲利後，便喜附庸風雅，以提高自己的格調，積極投入詩社詩會、賞畫、收藏等活動，讓社會瀰漫了一種愛好文學及藝術的氛圍。⁷

這樣的風氣助長了富人與士人的交流，逐漸讓寫作、閱讀、出版的風氣在民間流行起來。明末蘇州、常州工商發達，富商除了以土地賺取利益外，也注意到其他的產業，富商加入印刷出版事業的經營，促成了明末的刻印技術進步⁸，書籍的產量快速成長，與社會經濟富裕帶來娛樂事業的勃興，讓通俗文學在明末大範圍的鋪展開來，這些文句淺顯、內容輕鬆的通俗文學作品，尤其吸引女性讀者的喜愛與閱讀，女性閱讀群體的出現讓書籍的需求大大提升，讓出版的產業成為有利可圖的事業，書坊商行經營者紛紛搶進這塊蒸蒸日上的消費市場⁹，女性在此氛圍下，提升閱讀樂趣，進而從被動的接受閱讀到主動的創造寫作，完成了才女文化的階段目標。¹⁰更甚者，還有較富有的家族得以出版自家女性的作品¹¹，讓

⁶ 參見王慧瑜：《明末清初江南才女身世背景之研究》，中央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16。

⁷ 以上論點多位研究者都提出相關的論述，如王慧瑜在《明末清初江南才女身世背景之研究》的〈社會風氣的助益〉一節裡即有論及，中央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16-21。另外在高彥頤的《閩塾師》中也有相關論述，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⁸ 參見王慧瑜：《明末清初江南才女身世背景之研究》，中央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22。

⁹ 詳見許周離：〈明清吳地婦女與通俗文學〉，《鐵道師院學報》，1998年10月第15卷第5期，頁51-53。

¹⁰ 見高彥頤：《閩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章中關於坊刻對於女性受教育、閱讀與寫作有精采的論述。

菁英階層的女性有發揮的舞臺，女性也更有積極的動力從事創作的行爲，各家族間還會交互閱讀，互相比較。

經濟富裕造就了時代風氣的開放與多元，江南擁有當時豐厚的經濟資源，發展成了號稱全國最富庶奢華的地區，社會風氣瀰漫著崇尚文藝的氣息，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婦女文學風尚，女作家人數激增，根據胡文楷的《歷代婦女著作考》中的紀錄，明代的女作家占了 238 人之多，在清代以前的中國漫漫歷史長河裡的五百多人裡，佔了近一半的數量，這是明代以前所沒有的現象，可見婦女文學的開展在明末已是時代的風氣，並由此開啓了清代女作家大量崛起的先河。¹²除了以上經濟與社會風尚的間接影響外，明末文壇的氣息也影響著婦女文學的興盛，以下再據明末的文學風氣論述其對婦女文學的影響。

明代統治階級爲了鞏固政權，採取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專以四書五經爲題，內容形式都有所限制，造成士子無不陷入八股文的泥淖裡，並極力推崇程朱理學，讓思想難於突破傳統道德的窠臼。明初，政治清明穩定，經濟逐漸繁榮，由三楊¹³領導的雍容典雅、體現太平盛世的台閣體文風，但這種脫離社會生活，缺乏深湛內容，徒有其工麗的形式逐漸爲時代所不容。接著在弘治、正德年間以李夢陽（1473-1530）、何景明(1483-1521)爲首的「前七子」，與嘉靖、隆慶年間以李攀龍(1514-1570)、王世貞(1526-1590)爲首的「後七子」，提倡文學的復古運動，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確重重打擊了明初台閣體內容貧乏的文風。從弘治到萬曆年間，「前後七子」領導文壇百年，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認爲秦漢文不但氣勢充沛，而且內容充實，實爲文章之典範。而唐詩雅正莊重，氣韻飽和，實爲詩作之正格。爲文作詩應學習古人格調，遵循古人法式，卻因此在文壇上領導了「擬古」的風氣，以摹擬爲文學創作的途徑，亦步亦趨的模仿古

¹¹ 如本文的研究作家徐媛，作品即是由其夫婿資助出版。另外還有葉氏家族的《午夢堂全集》，也是葉氏三姝的父親自行刊印出版。

¹² 據胡文楷的《歷代婦女著作考》統計，清代的女作家數量共三千五百餘人。又據曼素恩在《蘭閨寶錄》中以《歷代婦女著作考》爲根據，分析得出清代女作家光分布於長江中下游的就有 2258 人之多，占女作家總數的 70.9% 之多，若再縮小範圍爲長江中下游各州，則可得出蘇州即有 466 人，居各州之冠。可見江南地區的確在婦女文學的領域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¹³ 「三楊」指的是楊士奇、楊榮及楊溥。楊士奇(1365~1444)，名寓，士奇是他的字。泰和(今江西泰和縣)人。楊溥(1372-1446 年)，字弘濟，石首(今湖北省石首縣)人。楊榮(1371~1440)，字勉仁。建安(今屬福建)人。

人，卻只得其形貌，而不能得其氣韻，結果流於內容空洞、形式乏善可陳、剽竊蹈襲的弊病，遂出現了反擬古的思潮¹⁴

到了晚明，反擬古的力量擴大，出現了一股文藝新思潮。以王陽明的心學為始，標舉「致良知」，打破了過去束縛身心的各種教條，反求回自己的本心。這種精神被後來的泰州學派發揮的更加淋漓盡致，認為人與聖賢並無先天的差別，反對道學家強調的禁慾主義與虛偽的禮法，解放了明代禁錮已久的思想。其中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具有強烈批判性格的李贄。

李贄的(1527-1602)思想受了泰州學派的啟發，也受到佛學禪宗的影響。尤其在女性觀方面有過人的識見，站在平等的立場上，李贄講求男女平等。他受《易經》及佛學經典的啟發，加上自己獨到的見解，賦予女性與男性同等的地位與才能。¹⁵首先李贄否定傳統上「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的想法，他在〈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中說：

……夫婦人不出閭域，而男子則桑弧篷矢以射四方，見有長短，不待言也。……故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以可乎？¹⁶

他認為女子長期受到禮教的約束，不可任意外出，所以無法像男子一樣四處遊歷以增見聞，若只因此而說女子見短則失公平。他還認為男女在教育上應有平等的機會，若讓女子受教育，則其識見將更獨一無二、並進而肯定女子的才能¹⁷，其《初潭集》中記載有才識的婦人、女子，對於才德過人、識見卓絕的女子，讚譽有加，直稱為真男子。所以他積極提倡女子教育，並積極落實男女教育平等，講學時男女雜處，雖然受時人非議，還惹來殺身之禍，卻是他具體理想的實踐。

¹⁴ 關於前後七子的復古主義思潮參見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1月，頁196-202。

¹⁵ 見陳清輝：〈李贄的女性觀〉，《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2001年9月第九期，頁116-117。

¹⁶ 見李贄：〈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收編於張建業編：《李贄文集》之《焚書》卷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54。

¹⁷ 有關李贄在女性問題的思想突破，可參見鍾師慧玲的《清代女詩人研究》第二章第一節。

提了肯定婦女才能、提倡女子教育，李贄在婚姻觀與貞節觀部份，也有進步的思想。李贄認為婚姻當以愛情為尚，道德為高，兼顧現實利益調和¹⁸。因為強調愛情，所以李贄讚美卓文君的勇於追求愛情：

……徒失佳偶，空負良緣，不如早日抉擇，忍小恥而就大計。《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雲從龍，風從虎。歸鳳求凰，安可誣也！¹⁹

李贄對婚姻自由、追求愛情極力肯定。對於明代嚴苛的守節風氣，李贄則是充滿同情與不忍，他贊揚尊重婚姻自由，贊同女子改嫁的人，斥責不通情理不許再嫁，頑固不通之人，基於愛情而自願守節，他敬佩之，但是對於沒有愛的基礎而強迫為其守節，這則是頑固不靈的²⁰，可見他對於守節的觀念是較為開明、合乎人性性的態度。

李贄在女性規範最嚴苛的時代提出異於時代的激進想法，讓時人獲得相當大的啟發，但他也因為這些異論，使得自己遭明神宗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下獄治罪，在當時代以如此激烈手段提出先進的女性觀，而無懼刑罰與外在言論壓力，實屬不易。

接續李贄之後，文學新思潮有李贄的三位得意門生：公安「三袁」的性靈文學主張。徐媛的生存年代大約就與其三兄弟同時。范允臨曾作〈為龔侍御題杜機園〉²¹，而龔侍御即為袁中郎母舅，另據《輸寥館》卷一范允臨的記載：

庚辰九月六日登虎丘觀袁中郎祠，余所書額上墨為人所損，取筆修之。……²²

¹⁸ 陳清輝：〈李贄的女性觀〉，《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2001年9月第九期，頁119。

¹⁹ 見李贄〈列傳〉〈儒臣傳·司馬相如〉，收編於張建業編：《李贄文集》之《藏書》卷三十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719。

²⁰ 見陳清輝：〈李贄的女性觀〉，《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2001年9月第九期，頁122。

²¹ 見范允臨：《輸寥館集》卷一。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01，北京，2000年，頁195。

²² 見范允臨：《輸寥館集》卷一。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01，北京，2000年，頁197。

可見范允臨應與袁中郎有所聯繫，交遊關係理應相當良好，范允臨的觀念應也多少受其影響，徐媛與夫婿感情甚篤，間接的或許也受了性靈派的影響。

公安派「三袁」領導性靈文學，影響了整個晚明時期的文學思潮。長兄袁宗道(1568-1610，字伯修)、次兄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么弟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均為此學派的靈魂人物，其中尤以袁宏道與范允臨有相當程度的交往，在《輸寥館集》中保有兩人唱和的作品。他們以「性靈」為學說的中心思想，強調文章須能抒發自身的感情與性靈，應該是自然天性的流露。袁宏道在〈敘小修詩〉中讚揚其弟的詩云：

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魂。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²³

於是正式喊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口號，只要是性靈之作，秉性自然出於內心，是真性情、真感情的流露，就算是疵處亦是佳者，這種以抒發情感為本位的觀念，對晚明小品具有積極的催生力量。至於「不拘格套」，則是指在格式上可以任性發揮，無須受形式的拘束，將文學的格式大大的解放，只要具備獨創精神，就算俚語、戲謔的文句也有創新精神，因為那是具有本色的獨造語。他們強調「真」所以強烈反對任何的因襲模擬、剽竊仿作，反對沒有自我精神的寫作，對於前後七子的復古模擬文風，予以嚴厲的批評，認為一代有一代的文學，若後代謹遵前代，並專事模仿，則文學發展將停滯不前，徹底將前後七子的復古運動顛覆，讓前後七子的文學思潮逐漸沒落。²⁴

他們還重視民間的戲曲小說、歌謠的文學價值，認為戲曲、民謠最能反映民間的真實生活，深具有現實的寫實意義，比起那些擬古假道學的才子之作，其實高明許多。在公安派的影響下，也讓明末的俗文學作品，得到了更好的發展空間。

²³ 見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一。台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9月，頁177。

²⁴ 參見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1月，頁208-213。

雖然不久之後，公安派就被竟陵派取代，但其影響力卻已然開展，自由活潑的寫作風氣，讓所有人都能暢所欲言，不管他是高官士子、或是販夫走卒，都有權利一吐心中塊壘，在創作的領域裡獲得了平等的機會，即使閨閣女子、女冠藝妓，也都有了發聲的空間。

值得再一提的是，袁中道承續了李贄的婦女觀，持續在晚明社會中注入關懷女性的流風。鄭培凱先生曾就袁中道的作品中分析出他的婦女觀：袁中道認為女子在德性智慧才略方面與男子無異，但是社會環境卻不允許她們發展；在婚姻方面處於從屬的地位，雖然地位較顯低下，但一位聰慧、儉以待己寬以待人、善於持家的婦女，卻是社會、家庭和樂的真正泉源；夫妻關係方面，他認為夫婦在感情上應是對等關係，當有真正的感情交流，並應視妻子為具有獨立人格的「人」，而非附屬品的「物」。²⁵雖然他的婦女觀大致沿襲自李贄，也不曾發展出一套系統的男女平等觀，但是持續的關懷婦女處境，也是值得我們稍加留意的。

開明的文學風氣，讓士人普遍對於家庭中女眷的識字習文、寫作創作可以站在支持的立場，一方面以家中女眷能詩善文自豪，另一方面培養女子未來為人妻母時，可以兼具教育子女的工作²⁶。晚明婦女作家漸興，婦女作品逐漸受到重視與蒐集，²⁷開放的文學氛圍是最好的助力。

開放多元的文學理論與當時的社會資本主義、城市商品經濟相輔相成，將晚明社會從心理層面到物質層面徹底的解放，擴及到婦女階層，讓受教育、識字不再只是男性的權利，女性也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的文學空間，於是乎也為婦女文學的興起，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讓明末成為了中國婦女文學的重要開端。徐媛就

²⁵ 鄭培凱在〈晚明袁中道的婦女觀〉中，由袁中道的〈壽大姐五十序〉、〈袁母鍾太孺人墓誌銘〉及一些朋友家眷的墓誌銘以及〈貞魂志〉、〈祭亡妾周氏文〉……等作品中析論出他的婦女觀，並提出與其本身行為的矛盾點，頗具參考價值。可參見〈晚明袁中道的婦女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993年6月第一期，頁201-216。

²⁶ 相關論點亦可參見曼素恩：《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出版 2005年11月，頁292-336。吳智琪：《徐燦及其作品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7年六月，頁14、15。

²⁷ 這點可以在許多由士人資助的女性作品集問世可以得到證明，徐媛的作品就是由其夫婿刊印。

是生長在這樣一個開放的時代，加上其家學淵源與夫婿的支持鼓勵，遂得以成就她成爲一名女性作家，在婦女文學史中佔有一個位置。

第二節：徐媛的生命歷程

徐媛字小淑（1560-1620），長洲人(今江蘇蘇州)。關於徐媛的生卒年，據筆者掌握的資料就有幾種不同的說法：最早提及徐媛生卒年的爲馮沅君先生，馮先生在〈記女曲家黃娥徐媛〉文中推測：

……就錢希言絡緯吟序看來，她與范允臨結婚時，范還是個未遇的寒士。這一點允許我們假設她是范的元配，夫妻間的年紀相差不遠。范允臨生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那麼她的生年應該在一五六〇年前後，她的卒年不可考。²⁸

其後爲謝伯陽先生《全明散曲》所載：

生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卒於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六十一。²⁹ 這個說法也是後人引用最多的，隨著女性藝術家逐漸被重視，近年編撰的明代藝術家總集裡若提及徐媛生卒，也都以這個說法爲據。³⁰

另外在 2004 年有兩名學者提出徐媛生卒年的新看法，其一爲汪超宏先生發表於《中華文史論叢》的〈范允臨的散曲及其生平考略—兼談其妻徐媛的生卒

²⁸ 見馮沅君：《中國古典戲劇研究》，台北：學藝出版社 1981 年，頁 437-438。

²⁹ 見謝伯陽：《全明散曲》，濟南：齊魯書社，1994 年，頁 3326。

³⁰ 如齊森華、陳多、葉長海編：《中國曲學大辭典》，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 12 月，頁 129。

年)，他從汪琬所作〈前明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范公墓碑〉³¹推論徐媛的卒年當是萬曆四十六年(1618)，並從其結婚年齡推斷徐媛生年應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僅五十三³²，但在汪超宏先生論斷徐媛的結婚年齡時，也是單憑自己的猜測而缺乏直接的證據為佐證，且以汪先生的推算，若徐媛生於嘉靖四十五年，則徐媛將比范允臨年紀小了八歲之多，這與明代的社會婚俗習慣有所不符。

其二為王莉芳與趙義山合著之〈晚明女曲家徐媛初論〉，文中亦從汪琬的范公墓碑推敲徐媛卒年當是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³³，並根據謝伯陽先生說的徐媛年六十一，推算徐媛生年當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³⁴此篇論文在徐媛生年的考證上略顯粗糙。

因為汪琬的碑文是康熙年間范允臨子范必英遷徐媛與范允臨繼室仲氏墓與范允臨合葬時寫的，距離范允臨死亡時間至少已過二十多年，徐媛又比范允臨早死二十多年，年代更久，且汪超宏先生從明史記載的雲南武德成事件考證范允臨生平，也發現汪琬的碑文有時間記載上的誤差³⁵，因此以汪琬碑文為考證依據似也有盲點存在，因此無法完全以汪琬的記載為依歸而判斷徐媛的生卒年。

筆者將以馮沅君與謝伯陽先生所推定的的生年(1560)為徐媛的生年，而以王莉芳與趙義山推算的卒年(1617)為徐媛的卒年，即以徐媛生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卒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年五十八歲，鋪陳徐媛的一生經歷。

在明末江南商業繁榮，城市經濟富庶，且文風鼎盛、女性作家群起的時代，徐媛享有一定的名氣，與陸卿子並稱「吳中二大家」。人生經歷必定影響一個作家的作品呈現，因此要了解作家的作品，必先了解其人生經歷，以下即從文獻的爬梳中，試著將她的一生經歷稍事整理，並略分為少女時期教育養成的家學淵

³¹ 見汪琬：《堯峰文鈔·卷十》，文淵閣四庫全書/131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 1993 年，頁 291-293。

³² 見汪超宏：〈范允臨的散曲及生平考略-兼談其妻徐媛的生卒年〉，《中華文史論叢》，74 輯，2004 年 1 月，頁 228-230。

³³ 此處兩人引用皆是汪琬的范公墓誌銘，但結果相差一年，應是計算上的誤差。

³⁴ 王莉芳、趙義山：〈晚明女曲家徐媛初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 7 月第四期，頁 91。

³⁵ 見汪超宏：〈范允臨的散曲及生平考略-兼談其妻徐媛的生卒年〉，《中華文史論叢》，74 輯，2004 年 1 月，頁 227。

源，婚後的文學興趣養成，及其夫范允臨高中之後隨夫宦遊、廣結善緣，和隨夫婿罷官隱居太平山後歸隱悟道的晚年生活等四個小節。因為女性作家在男性主導的史籍與文學環境之中實在少有立足之地，所以資料的取得甚是困難，只能從其父親、夫婿的經歷及其他相關的序跋漸次拼湊，實難齊全，若日後能取得其他相關資料再容補足。

一、少女時期的家學淵源

明末的蘇州，城市經濟繁榮，人文薈萃，文風鼎盛，女性在這開放的氛圍裡，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學才能，蘇州的女性作家據統計有 148 人，僅次錢塘與常州³⁶，可見當時蘇州城的文風與支持女性書寫的態度。徐媛的父親徐泰時(1540-1598)³⁷是名學者，在明神宗萬曆八年中進士(1580)，授工部主事，進郎中，遷光祿少卿轉太僕寺少卿，後以不合掛冠歸。徐媛的母親董宜人，也是來自書香人家，徐媛表弟一家也是享譽當代的文士，董嗣成(字伯念)是萬曆八年進士，嗣成弟董斯張(字遐周)也是個鄉試中舉的舉人。徐母也擁有良好的家世背景，除了是書香門第也是富豪之家，在《蘇州歷代園林錄》中記載著徐泰時在閶門外起建東園時，園中那座高三丈餘的湖石---「瑞雲峰」，就是由南潯董氏處所得，更因此石締結徐董二家的聯姻緣分，³⁸當時的徐泰時非常富裕，明代又十分講究門當戶對，可見董氏一家也非平凡人家，因此徐媛的母親擁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應該毫無疑問，在范允臨的〈明太僕寺少卿輿浦徐公暨元配董宜人行狀〉也可佐證：

潯陽公為苕之望族，甲第如雲，至貴倨矣。而宜人恂恂早抑執婦禮甚恭，

³⁶ 見曼素恩《蘭閨寶錄》，台北：左岸文化出版 2005 年 11 月，頁 441。

³⁷ 見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5 年，頁 463。

³⁸ 見魏嘉瓚：《蘇州歷代園林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 12 月，頁 152。

公率宜人旦晚上堂視寢膳，太宜人安之曰：「此真吾佳兒佳婦，餘子僅知棗梨耳。」³⁹

可知董宜人是浙江望族之後，且家族中人在科學考試中也多有成就。浙江在明末培育了許多進士與才女，⁴⁰可知當地風氣對於女性教育也是保持著開放的態度，所以董宜人想必也是個頗具才學並深諳婦學之道的大家閨秀，身為母親之後，對於兒女教育自是重視有加，徐媛在母親的教導下，成為一位舉止合宜、儀態優雅，且知書達禮的閨秀。⁴¹

既然徐泰時興建東園時，促成了與董宜人的婚姻，所以可知徐媛小時候應該就是住在徐泰時興建好的東園裡，明末蘇州這些詩情畫意、玲瓏精巧的園林，也提供了才女們高格調的藝術薰陶。⁴²東園的富麗在袁宏道(1568? ~1610)〈園亭記略〉載：

徐岡卿園，在閶門外下塘，宏麗軒舉，前樓後廳，皆可醉客，石屏為周生時臣所堆，高三丈，闊可二十丈，玲瓏峭削，如一幅山水橫披畫，了無斷續痕跡，真妙手也。⁴³

生活在這樣優雅富麗的環境，家境十分富裕，且父母都是讀書人，徐媛小時候可以說是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在那個風雅的時代，既然經濟不虞匱乏，生活無虞，此等風雅的書香門第，自然也期望自己的女兒在文學上能有所涉獵。⁴⁴這樣開放的教育觀，讓徐家一門風雅，有多位親戚在科學考試裡獲得良好成績，還培育出了多位著名的女詩人，如徐燦及徐文琳等。⁴⁵除了徐泰時中進士，徐媛的堂弟徐子懋也官至光祿丞(徐子懋是徐燦的父親)，從徐媛作品裡給表弟、親弟的信件以

³⁹ 見范允臨：《輸膠館集》卷五頁 15。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01，北京，2000 年，頁 314。

⁴⁰ 參考自曼素恩：《蘭閨寶錄》之附錄-清代婦女作家之地域分布，頁 438-442。

⁴¹ 培養閨秀成為可以教育下一代的賢良母親，也是明末女學興起的原因之一。見曼素恩：《蘭閨寶錄》，頁 420。

⁴² 見戴慶鈺：〈明清蘇州名門才女群的崛起〉，《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 年第 1 期，頁 131。

⁴³ 見錢伯誠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180。

⁴⁴ 曼素恩在《蘭閨寶錄》第四章第一節「男人眼中的博學婦女」中，開宗明義的說到：「精英家庭中的父親非常重視女兒的教養。」讓女兒受教育除了炫耀的目的外，也增加女兒在婚姻市場中的價值，因為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可以在為人母親之後，負起教養兒女的責任，頁 420。

⁴⁵ 見吳智琪：《徐燦及其作品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民 96 年 6 月。

及詩作中贈與女性親屬的如〈寄團扇與表妹〉、〈寄懷丁氏妹〉、〈寄表妹周娘二首〉、〈寄贈年家妹二首〉、〈贈孟年妹花燭詞三首〉、〈賢姪娘子以扇索書戲占口號二首〉、〈寄女姪哭其先慈六絕〉、〈送表姪女吳夫人北上二首〉、〈贈姑母〉，可知她的親戚裡，不分男女，皆能以書信傳遞訊息，且能往來唱和。

徐媛擁有良好的家世以及家族裡開放的教育態度，加上幼年即聰慧有餘，又是家中的長女，父母疼愛有加，因此徐媛擁有一個備受呵護的童年。不過，優渥的生活卻無法保證擁有健康的身體，徐媛小時候身體並不健康，很容易生病，而父母因疼愛女兒，雖然家庭中對於女子的教育十分重視，但也不忍強迫她學習書史功課：

細君生而孱弱，幼善病，病輒稱據。顧性頗多慧，剪綵刺繡不習而能。

父母絕憐愛之，不欲苦以書史銘槩之務。……

細君曰：「……余少而多幽憂之疾，父母雖不欲困以詩書，而深慕古賢姬名媛，英敏明慧，似不欲余作慵寐人，余竊窺父母志而思成之。……」⁴⁶

可見晚明上層階級對家中女兒教育十分重視，且樂於培養一位知書達禮的大家閨秀，影響著徐媛的家庭教育，只是因為幼女的體弱多病而不忍強加壓力，但徐媛則細心揣測父母心思，而在心中暗忖要完成父母對自己的期待。

熊秉真的《童年憶往》裡記載明清士人家族裡對於幼童教育的重視與積極，課子的目的要求其仕進，光宗耀祖，除了父親擔任啓蒙角色之外，家族中的女性長輩也是教子的重要角色，稍長時還要向塾師學習，或由家族延師到家裡教導家族裡的幼童，⁴⁷在幼女教育方面，由明清兩代出現的專為幼女使用的幼教書籍，如《女小兒語》、《閨範》、《四字閨鑒》、《女三字經》、《閨訓千字文》等⁴⁸，都可見到明清時代對於女子蒙學的重視。生長在一個書香世家內，雖然身為女子，徐

⁴⁶ 范允臨：〈絡緯吟小引〉，《絡緯吟》，《四庫未收書輯刊》第柒輯 1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頁 298。

⁴⁷ 見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第三章：環境的堆砌與塑造，頁 79-127。

⁴⁸ 見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頁 152。

媛一樣可以擁有良好的教育機會，在稍長之時還從閨塾師處得到了文學和道德的教育，故深諳婦學之道，所以父母非常疼愛她，⁴⁹在《絡緯吟》錢希言的序裡明確地記錄著：

夫人髫年緝學，曉暢內則諸書大義，其父太僕公與母董恭人，絕憐愛之。

50

這些對於婦女道德的教育養成，影響了她作品中關於女訓道德的相關題材。

另外范允臨也在〈絡緯吟小引〉中提到徐媛有機會從閨塾師學習的歷程，卻因身體不夠強健，而常因病中斷學習，可見徐媛雖然擁有良好的受教育機會，卻因身體狀況讓她的學習之路並非十分順暢：

少長，間從女師受書，輒以病廢，經年無幾月親筆札，一片紫硯幾成石田矣。⁵¹

由此可知，徐媛擁有一個幸福快樂的童年，因為家庭環境的優越與家庭重視女子教育的風氣，讓徐媛在幼年時期可以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又因身體不夠強健，父母對她並不特別要求，但她私自揣測父母心意，仍心嚮往之，所以對於書史功課皆能有所涉略。良好的基礎教育養成，影響著未來徐媛婚後得以以自學方式，閱讀書籍，並與夫婿唱和往來，為女詩人的出現奠定良好的根基。

⁴⁹ 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 月），頁 280。

⁵⁰ 筆者所採之《絡緯吟》微捲資料，為中央圖書館出版，為明萬曆癸丑(1613)吳郡范氏刊本，此版無錢希言之序，筆者引用〈錢希言序〉係轉引自《歷代婦女著作考》，頁 112。

⁵¹ 范允臨：〈絡緯吟小引〉，《絡緯吟》，《四庫未收書輯刊》第柒輯 1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頁 298。

二、婚後的文學興趣養成

徐媛嫁給按察副使范允臨（1558-1641）是她藝文生命的另一新頁。傳統女性的婚姻影響著女性的生活甚鉅，所以要了解徐媛的婚後生活，必定也需對其夫婿有所了解，以下略敘其夫范允臨：

范允臨(1558-1641)，字長倩，吳縣人，是宋范仲淹第十七世孫。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南兵部主事，仕至福建參議。後歸築室天平山之陽，故人及四方知交之來吳者，恒與遨遊山水間，極盡風雅之事。他擅書畫，與董其昌齊名，在書法藝術上的成就似乎比文學上的成就還高出許多。⁵²在今人的多本書法字辭典上都可見到范允臨的相關記載⁵³，可見他確是風雅之人。這樣的成就可能也影響了徐媛，因為徐媛的書畫也在藝術史中佔了一席之地，例如在今人所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中徐媛亦名列其中，並說明徐媛「以書著名，有天上謠墨蹟傳世。」⁵⁴，另在范允臨的《輸膠館集》裡，也看到了范允臨為徐媛臨摹的書畫作品寫跋⁵⁵，可見范允臨對於妻子的書畫學習也頗為支持與讚賞，如在〈跋內子所摹宋楊畫像贊〉中，范允臨說到：

…婦人手腕柔弱，故其書多作媚態，亦多偏鋒。而此獨適逸雅健，出鋒甚正，頗得烏衣筆意，絕不作閨房脂粉纖媚氣，可稱能品。⁵⁶

另在〈跋內子所臨新茶帖〉裡又說：

…吾家細君喜摹古帖而能自出意態，非隨人笑語者，倘從此變化入神，何難做書家主人翁耶！⁵⁷

⁵² 見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民 54 年，頁 361。

⁵³ 例如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裡即有范允臨條，另在《中國古代書法家辭典》裡還有范允臨的詳細介紹及墨寶，見吳養木主編之《中國古代書法家辭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305。

⁵⁴ 見文史哲出版社編輯之《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年，頁 715。

⁵⁵ 見范允臨：《輸膠館集》卷五頁 15。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01，北京，2000 年，頁 341、342。

⁵⁶ 見范允臨：《輸膠館集》卷六頁 24。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01，北京，2000 年，頁 341。

⁵⁷ 見范允臨：〈跋內子所臨新茶帖〉，《輸膠館集》卷六頁 24。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01，北京，

范允臨稱許徐媛的畫作「不作閨房脂粉纖媚氣」，讚美其書法可做「書家主人翁」，可見范允臨對於徐媛的書畫頗有欣賞之意。在書畫上的砥礪琢磨，可以見到徐媛夫妻的確是高彥頤所說的「伙伴式婚姻」⁵⁸的最佳典範，除了婚姻的關係，他們還是心靈的伙伴，可以唱和、可以在文藝領域裡相互支持砥礪。

范允臨雖然亦出身名門，但在其父親范惟丕輩即家道逐漸中落。根據范允臨的〈明太僕寺少卿輿浦徐公暨元配董恭人行狀〉自述：

……吾少孤，十四而先君捐館，舍十五而母氏棄柩，余則育於外氏，從外氏最久。

可見范允臨與徐家的淵源當是自徐媛婚前即已建立，因范允臨父母早亡，故育於外氏，接受徐泰時的資助與栽培，甚至可能是直接住在徐家⁵⁹，所以婚後的徐媛應當也能獲得娘家的資助，而不必太過擔憂生活的問題。初嫁時，范允臨尚未有功名，且當時夫家家道漸弱，據錢希言序說徐媛「勞苦夜績，脫奩中裝以佐長倩讀」⁶⁰，這樣的記載，或許只是爲了要彰顯徐媛良好婦德的溢美之詞，而刻劃出刻苦耐勞、嫁夫從夫的賢妻形象。

自徐媛歸允臨至允臨中進士第，⁶¹這段范允臨準備科舉，赴京考試的日子，徐媛可能也在娘家的經濟資助下，無須擔憂生活問題，而也同時進行了長達二十餘年的學習路程，這段學習的過程造就徐媛良好智識與書畫成就應是不爭的事實，因爲在明末士子的生命歷程中，爲了求取功名，必須專心研讀書課以便在科舉中獲得良好的成果，在尚未取得功名之前，他必須盡量將身旁的瑣事與情愛放

2000年，頁341。

⁵⁸ 見高彥頤：《閩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5年1月），頁191-193。

⁵⁹ 在江南硯的〈徐家有女能教子〉中，他直言范允臨是入贅到徐家的，因此徐媛婚後仍居住在娘家。《蘇州雜誌》，2008年，第2期。

⁶⁰ 見《絡緯吟》錢希言之序，轉引自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台北：鼎文書局印行 1973年5月出版。，頁112。

⁶¹ 參看附表一：徐媛大事年表。

下，好積極投入考試之中，再加上上京趕考的時間往往很長，所以他可能有很漫長的歲月離家遠行，每隔一段時間才能回家一趟，儘管此時的他或許已經結婚，卻無法經常在家與妻子相處⁶²，長長的孤獨歲月，徐媛只好與群書為伴，或許正是徐媛得遍覽群書的原因。

這漫長的學習過程中，因范允臨喜好吟詠，徐媛於一旁觀看，產生了羨慕而深嚮往之意，提高了徐媛對文學的興趣與動機，再加上范允臨對於女性寫作抱持著支持的態度，所以，徐媛自然能在寫作的領域裡繼續深耕。後來，允臨離家當官，徐媛則利用閒暇時間廣泛閱讀，並仿效習作，並在詩歌藝術上獲得成就：

笄而從余，余時為諸生，雖屈首公車乎，然間以吟詠自喜。細君從旁觀焉，心竊好之，弗能也。迨余舉賢書，偕計吏，上春官，而細君閒居寥寂，無所事事，漫取唐人韻語讀之，時一倣效，咿唔短章，遂能成詠。⁶³

范允臨對於徐媛的習寫與對文藝追求的態度開放，甚且站在鼓勵與支持的立場，再加上范家本是書香門第⁶⁴，亦可提供大量典籍的閱覽，這在徐媛的學識養成上更是相得益彰：

余歸而碎錦滿奚囊矣。余曰：「何不遂成之？」從此汜濫詩書，上探漢魏六朝，下及唐之初盛，已而直溯三百篇根源，遂逮楚之騷賦。⁶⁵

⁶² 參見曼素恩在《蘭閨寶錄》中關於〈精英男子的生命歷程〉的詳細考察，台北：左岸文化出版 2005 年 11 月，頁 126-136。

⁶³ 范允臨：〈絡緯吟小引〉，《絡緯吟》，《四庫未收書輯刊》第柒輯 1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頁 298。

⁶⁴ 范允臨是范仲淹第十七世孫，父親范惟丕，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進士，故其家庭亦屬世家大族。

⁶⁵ 范允臨：〈絡緯吟小引〉，《絡緯吟》，《四庫未收書輯刊》第柒輯 1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頁 298。

這樣的夫妻生活帶給徐媛的不只是伴侶的支持，還有這段時日所吸收的書籍學養，讓徐媛往文學領域邁了一大步，並對自己的文學生活更具有信心，也發展了一套對文學的理念詮釋：

……獨不喜子美而私心嚮往長吉。……長吉雖鬼才然，怪怪奇奇，語多自創……吾寧伐山而釜缺，毋牙慧而鉅釘。故其為詩，多師心獨造，無所沿襲。即一字經人口吻，輒棄去弗用。⁶⁶

徐媛認為寫作不應沿襲，最好的是自創新語，對於李長吉則特別鍾愛，雖語多怪奇，但字字皆出己意，所以徐媛的作品裡多獨創字句，這樣的文學理念，與當時盛行的性靈學說相近，且其夫婿與公安派的袁宏道有所交往，在潛移默化之中徐媛應是受了些許的影響，在晚明前期，徐媛在文學創作上能有此等體認，可說是婦女文學的先鋒。因此，婚後的徐媛在不斷的吸收典籍之中與丈夫的支持鼓勵之下，建立了對文學藝術的喜愛與興趣，更發展出了一套自己的文學理想。

三、隨夫宦遊、廣結善緣的日子

范允臨的宦宦生涯中，曾任南京兵部主事、改工部(南京)，雲南提學僉事⁶⁷，又遷任福建參議⁶⁸，徐媛在這幾次的宦遊中多半都跟隨著丈夫。根據汪琬在〈前明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范公墓碑〉中記載：

⁶⁶范允臨：〈絡緯吟小引〉，《絡緯吟》，《四庫未收書輯刊》第柒輯 1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頁 298。

⁶⁷范允臨於明神宗萬曆 23 年（1595）中進士，授工部主事之職，旋改任雲南提學僉事。

⁶⁸關於范允臨的宦宦經歷，參見(李銘皖等修/馬桂芬等纂：《蘇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1989年) 卷 81 人物八范允臨，頁 1974。

……築室天平之陽，徙家居之。日夜流連觴咏，討論泉石，數與故人及四方知交來吳者，往還遨遊山水間。……⁶⁹

可見范允臨在工作之餘，置身於文人社會的核心，經常款待當時一流的士大夫，唱和、看戲娛樂及資助繪畫等等。徐媛和范允臨在這樣的氛圍裡，彼此唱和，交換詩作，可以說是江南地區上層社會的模範夫妻。⁷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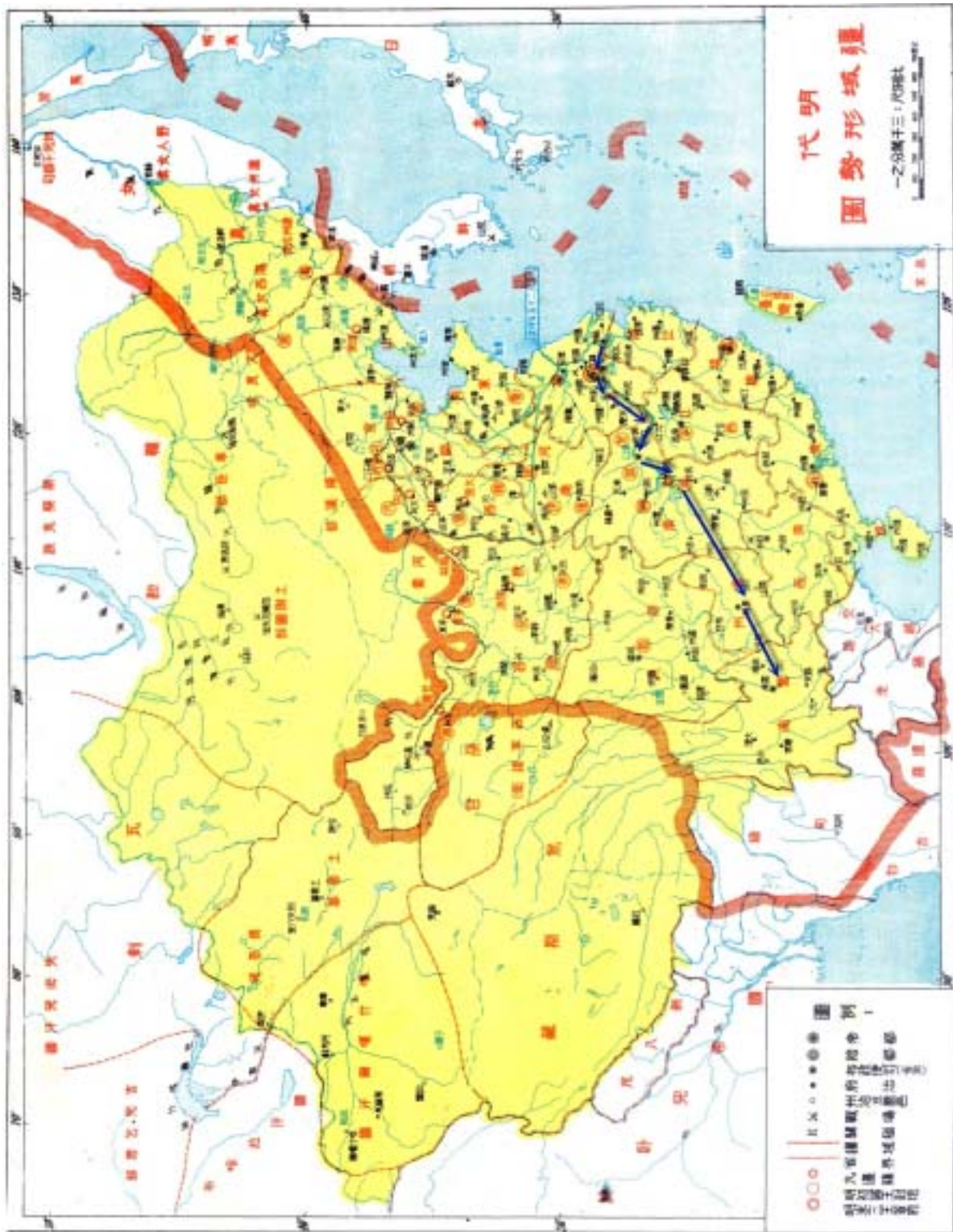
徐媛婚後隨著父親、夫婿的宦遊經歷，由北京、南京、而至雲南，筆者根據年表試作徐媛的宦遊經歷簡表如下：

西元記年	徐媛年齡	宦遊經歷	地點
1580	21	徐泰時中進士，隨徐公宦於燕。	北京
1595	36	范允臨中進士授工部主事之職	南京
1598	39	徐泰時歿，歸蘇州，奔父母喪。	蘇州
1603	44	孫病故，允臨委派使閩，未入閩旋遷雲南，隔年抵達雲南就任。	雲南
1608	49	遷福建布政使司，罷官。歸天平山。	蘇州

這幾次的旅行，橫跨了近千里的距離，沿途經過的風景，大大拓展了徐媛的寫作題材。另筆者又根據范允臨的仕宦經歷，將徐媛隨夫宦遊的旅遊路徑大致勾勒，並製圖表如下頁：

⁶⁹ 見汪琬：《堯峯文鈔》卷十，收於《續修四庫全書 13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 292。

⁷⁰ 高彥頤：《閩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5年1月），頁 281。



註：此地圖參見中國文史地圖網：

<http://www.pro-classic.com/ethnicgv/cmmaps/1966/roc19.htm>

路徑圖則以筆者參考范允臨世宦經歷，他於明神宗萬歷 23 年（1595）中進士，授工部主事之職，時俱在南京，旋改任雲南提學僉事，徐媛此時便跟著夫婿展開宦遊的千里行，根據徐媛於詩文中陸續出現的地名，加上因其學家遷徙，行李必定繁多，故揣測應由水路往雲南前行，故做整理如圖。

傳統中國婦女經常是無法遠行的，一旦丈夫遠行，她必須守候在家，侍奉翁姑、養育孩子，將家裡妥善打理再癡癡等後遠行的丈夫歸來，這也是文人筆下思婦的典型形象，明代因禮教的束縛加劇及纏足風俗的流行，婦女遠行更顯困難。而徐媛有幸在丈夫出任官職時，可以隨行在側，可能與范允臨早孤有關，她可以不必侍奉翁姑，免除了許多傳統家庭加諸在媳婦角色的壓力與期待，因此徐媛可以放下家裡的擔子，跟隨著夫婿走馬上任，雖然遠行有許多不便與辛勞，但是與夫婿相依相守可免除相思之苦，且漫長的旅途，沿途風光與人事的接觸，大大拓展了她的視野，豐富了她的創作內涵。

在她的作品中即出現了為數不少的羈旅之作，如在南京時寫了〈金陵弔古二首〉、〈將去金陵別東隣諸老母二首〉、〈金陵留別叔母三首〉、〈留別金陵官舍九首〉；到了當時化外之地的雲南，又遇上邊境騷動，則有〈滇中曉望〉、〈寓邊城兵靖作〉、〈滇南別馬夫人三首〉、〈別馬小夫人二首〉、〈滇寓邊城被警〉；旅途中還有經安徽時的〈蕪陰晚眺〉、經湖北時有〈蒲圻道中雨〉、達湖南時有〈題瀟湘八景〉、到貴州時的〈過貴陽道中〉對於不同地區的景物風貌、人情民俗都有不同的體會。

這幾次雲遊四海的宦遊旅行，讓徐媛的見識大開，驚嘆於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奧妙的刻畫著這片亙古的大地，的確讓徐媛的文學題材大大的擴展，不只限於臥遊的想像，更可將旅遊的所見所聞、心境，化為詩句，在董斯張的序文裡便說明了徐媛的旅行經驗與寫作概況：

吾姐范夫人隨其夫子宦遊四垂，而石城，而蕪陰，弔古中宵，酸風射眸，觸境成詠，鬱為名作。其後萬里入滇，溯大江而道黔巫……⁷¹

可見徐媛豐富的遊歷經驗，為她帶來豐富的寫作材料，豐富了她作品的內涵。

徐媛的隨夫宦遊生活，由范允臨就任南京始，當時徐媛約三十六歲。⁷²初任

⁷¹ 董斯張：〈徐姊范夫人詩序〉，《絡緯吟》，《四庫未收書輯刊》第柒輯 1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頁 300。

官職的范允臨夫婦在南京的日子，一開始似乎還頗能自適，曾留下一些旅遊、節慶的歡樂記載，但在多年的旅居生涯後，徐媛對於在南京的歲月逐漸產生一些心境上的改變。徐媛用曲作〈二郎神一套連尾〉五首，來訴說自己的思鄉情懷，並在〈尾聲〉時說「吳宮花草還依舊，爭奈我親遠天涯淚滿眸，怎比得勒石曹娥芳書姓字留。」⁷³說明想念父母，未能在身旁盡孝道的無奈。

萬曆三十一年，徐媛年四十四歲，這一年是徐媛人生中的一個轉捩點，在〈悼冢孫文〉⁷⁴中徐媛自述：

癸卯歲，旅白下。長倩奉使閩中，予亦得返吳中焉。便間與鉉兒委禽，乃攜李右諭德間山屠公女孫、孝廉思韋公季女也。婉孌嫻默，克循閩規。適長倩有正郎之擢，不果入閩。遂鼓秣陵之棹，偕兒與媳行。未幾，而娠將期，就館。阿翁復有滇南校士之遷，泛江而歸。抵家兩浹旬，兒媳免身，得雄。是日作湯餅會，孫生也。……未究其症，遂殤。

這一年，旅居南京的徐媛因丈夫奉使福建，所以她也有機會回鄉，此行並順便幫兒子下聘，將多年前的婚約完成⁷⁵，此時范允臨擢郎中，故不往閩中去，只好攜兒帶媳，舉家再往南京，不久，媳即將臨盆，而范允臨卻又再遷雲南，此時媳婦生了一個男丁，舉行了湯餅會慶祝，還因幼兒尚小，延後赴滇的時程，但此幼兒卻患病夭亡，讓徐媛非常悲傷。所以這一年徐媛歷經了身分的改變，成為婆婆的角色，還將為人祖母卻又遭遇孫兒夭折之苦，而夫婿即將赴遠方任職，詩人必須千里跋涉，隨夫前往一個未知的地域，這段經歷將徐媛的作品開拓出一個全新的視野。

⁷² 參見附錄一：徐媛年表。

⁷³ 見《絡緯吟》卷十，《四庫未收書輯刊》第柒輯 1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頁 392、393。

⁷⁴ 見《絡緯吟》卷十一，《四庫未收書輯刊》第柒輯 1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頁 405。

⁷⁵ 范允臨《翰蓼館集》卷四〈孝貞婦屠氏小傳〉記載，萬曆十七年(1589)時，由董其昌作媒，將屠思韋女許配給當時才五歲的范允臨子鉉兒，距離此年下聘，已過十五年。

除了遊歷經驗的擴展，丈夫的支持與經濟生活的不虞匱乏，讓徐媛得無後顧之憂，並開展了自己的人際關係。因為徐媛家境優渥，所以可以有閒暇時間與金錢可以外出旅遊，甚至邀請歌妓演出娛樂。除了與陸卿子相互交換詩作的密友關係而齊名，成就了「吳門二大家」的稱號⁷⁶，徐媛還與知名與不知名的歌伎往來，並在其作品中參雜了不少與女性身體相關的敘寫，這在當代封建的保守觀念裡，讓徐媛的作品多了點情色的味道與女性審美的想像空間，⁷⁷這一點讓徐媛與一般的閨秀詩人有很大的差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根據筆者爬梳資料的結果，發現范允臨在徐媛生前應無娶妾，直到徐媛死後范允臨才娶了繼室。中國傳統上將傳宗接代視為宗族社會最重要的事，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古代醫藥不發達，嬰幼兒的死亡率極高，所以一般婦女在其生育年齡期間幾乎需要不停的生產，以增加家中人口，避免嬰幼兒的死亡造成家族延續的中斷，例如江南才女沈宜修(1590-1635)在其自長女出生的二十一歲始至四十六歲死亡，二十五年的生育年齡裡，一共生了八男五女，而十三個子女裡，卻有四個比宜修還早辭世⁷⁸。因此，生兒育女的風險和負擔，使妻子在丈夫納妾之後，不但不感到忌妒，反而鬆了一口氣。⁷⁹甚至有的正妻還會主動協助丈夫挑選娶妾的對象。范允臨曾在〈芝房跋〉中寫道：

……令內子居之，以當其瑞。昔燕姑徵蘭果毓令嗣，余薄德不足以當靈貺，倘天不終刈我後，請以此芝為嚆矢矣。⁸⁰

又根據汪琬〈前明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范公墓碑〉記載：

……既昏於徐，待徐氏尤有恩意。徐宜人無子歿，而公權命從孫能先主其

⁷⁶ 鐘惺：《名媛詩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339。總集類》台南：莊嚴 1997 年。

⁷⁷ 關於徐媛對於歌伎的書寫參見本論文第三章第四小節關於歌舞伎的題材分析。

⁷⁸ 見胡慧南：《沈宜修及鸚吹詩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 年六月，頁 223-227。

⁷⁹ 見曼素恩：《蘭閣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出版 2005 年 11 月，頁 148。

⁸⁰ 見范允臨：《翰齋館集》卷一。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01，北京，2000 年，頁 342。

喪，……⁸¹

可見徐媛夫婦子嗣單薄，在兩人所有作品中只有范允臨〈貞孝婦屠氏小傳〉中有提到其子鉉，兩人的〈訓子〉文中也均沒有提到其他兒女的相關資訊。又明代文人三妻四妾是十分普遍的現象，且普遍風流，文藝風尚重情尚才，倡妓自小受教良好的歌舞及琴棋書畫，與文人雅士可吟詩唱和，江南重要商業城市中倡樓酒館處處可見，士子狎妓風氣大盛甚或直接迎娶喜愛的妓當小妾，倡樓裡的妓也都以從良為其人生的最終目標，因此文人同時擁有多個姬妾，或是直接在家蓄聲妓以供宴會娛樂是十分普遍的現象。社會風氣如此，加上范允臨子嗣單薄，娶妾以增加家庭人口當是合理，就連其友人都想贈他姬妾，在其〈曹塵客念予艱嗣有姬相贈既而以讒間背盟作詩寫恨〉寫道：

解珮懷珠望以休，星房寂寐冷衾裯。看花暗憶□相似，臨水空傷淚共流。
莫向章臺窺弱柳，且尋磨勒事千牛。東風倘解多情意，吹夢吹愁到小樓。⁸²

曹塵客欲以姬相贈，後卻因讒言離間而須違背盟約，在資料中並無法看出贈姬的時間與是何原因導致此事的失敗。但在陳繼儒的《白石樵真稿》卷九中，有關於允臨弟允謙在蘇州閶門遇美妓杜書，動了真情誓同生死，其原配之父都御史陸樹德聞之大怒，訟於官，卻因縣官感動於允謙的真情，而不了了之，後杜書隨允謙入京，允謙病逝，杜書知必不見容於陸氏，遂躍江自盡⁸³，允臨往持其喪南還。⁸⁴筆者臆測這個事件或許影響了范允臨的納妾意願，但從文意可知范允臨對這位差點成為己妾的女子似有期待，因為范允臨對此事的不成心懷遺憾，且希望多情東風將他內心的想念與愁緒帶給這位小樓中的佳人。

儘管范允臨對其他女性有過想像，甚至也蓄有聲妓，有屬於自己的戲班子，

⁸¹ 見汪琬：《堯峯文鈔》，續修四庫全書 13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293。

⁸² 見范允臨：《翰寥館集》卷一。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01，北京，2000 年，頁 209。

⁸³ 范允謙事蹟轉引自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7 月，頁 51。

⁸⁴ 參見何三畏編：《雲間志略》，〈范孝簾牧之傳〉中也對此事有所記載，惟其「杜書」作「杜生」，范允臨為其兄，此傳則作其弟，但事件始末大致略同。收編與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之 147，台北：明文出版社，1992 年，頁 291-296。

在其詩作中有多首詠歌伎及記錄與歌伎們依依離別的场景，但對於其妻子的情義仍是存在的。在其詩作〈新月懷人〉裡寫道：

娟娟織月淨無雲，千里流光迥炤君。畫出蛾眉山更遠，飛來鵲鏡影難分。
環沉碧海寒蟾魄，弦控胡天起雁羣。織婦樓南怨清淺，流黃機上未成文。⁸⁵

這首詩作寫的就是對妻子的想念。兩人分隔，「織婦樓南怨清淺，流黃機上未成文。」雖是說閨中思婦無心紡織，又何嘗不是遠方遊子思念妻子的心聲呢！又在其詩作〈天池道士索余書，采蠶豆作供以當籠鶯，烹食甚甘。因念不得與內子共享，賦此寄懷〉⁸⁶中說：

道士求書豆作鶯，山廚烹食想青蛾。無由不得分甘贈，舉案齊眉奈爾何。

可見徐媛夫婦的感情甚篤，有美食享用，但念不得與妻子共享，內心覺得無奈而感懷。

古代的婚姻關係建立經常是因為要生養子嗣，到了明清時期的婚姻關係建立又加入了家族、家庭的利益考量，因此為求政治、門第、財富等利益，⁸⁷往往將沒有情感基礎的兩人藉婚姻繫在一起，待婚後才開始培養感情，若真無感情，丈夫們往往可以將性與愛分開，家庭中的是傳宗接代的責任，情感上的不滿足，他們將在外頭的風花雪月場合中獲得圓滿，而閨中留下的就是備受壓力與禮教束縛的怨婦。晚明士子在歡場的娛樂、狎妓與納妾風氣被整個社會所包容，⁸⁸范允臨不管是在何種原因下沒有納妾，但筆者認為在明末那個情欲橫流的普世下都是值得被肯定的。

⁸⁵ 見范允臨：《輸寥館集》卷一。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01，北京，2000 年，頁 208。

⁸⁶ 見范允臨：《輸寥館集》卷一。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01，北京，2000 年，頁 227。

⁸⁷ 見高世瑜：《古代中國婦女生活》，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 年 12 月，頁 87-105。另外在陳江：《明代中後期的江南社會與社會生活》中，提及明代中後期由於富豪家族嫁女時經常給予豐厚的嫁奩，因此提升了婦女在夫家的地位，此或許也是范無法娶妾的原因之一。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 年 4 月，頁 63-68。

⁸⁸ 見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在〈生活篇·好女色、重情愛〉對於晚明江南地區的娼妓文化與士人狎妓、蓄伎、納妾有精闢論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7 月，頁 48-62。

四、歸隱悟道的晚年

根據喬玉鈺在〈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明清才女的皈依佛道之風〉的分析,明清才女多在晚年時皈依佛教,⁸⁹另曼素恩也在《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中用了整個章節探討了明末盛清時期女性的生命歷程,將女性的生命晚期歸於宗教,認為在大半生為家庭的貢獻犧牲,與身體對家庭最重要的能力--生殖能力逐漸消失之後,女性終於可以卸下肩上的重擔,走入宗教,在身體與心靈上尋找精神的依託⁹⁰,因此宗教在多數女性的晚年時期都占據重要的位置。徐媛的晚年也是,她走入了佛教,並取了法名「淨照」⁹¹,可見徐媛晚年對於佛教的信仰,有著積極的投入。

徐媛中年時,徐媛遭父母喪、孫兒又病歿,面對人生生離死別的無情,再加上范允臨的仕途不順遂,據《蘇州府志》記載,當時范允臨任雲南提學僉事,時值鳳阿克反叛事件,允臨帥居民守城有功,卻不僅未受封賞,反再遭讒口被遷任福建,范允臨便決定辭官返家,歸隱於天台山⁹²,徐媛隨著夫婿返回故鄉。夫婿的仕途不順遂,徐媛的思想也隨著產生一些變化,看盡塵世浮沉,走遍大江南北,遂興起了嘆世歸隱的感慨,作品中幾篇感嘆的詩作,應是徐媛在返回蘇州的路途中或之後的作品,如:〈客舍獨坐四首〉

〈其三〉欲視眼前果,須知宿有因。若明我即我,從他身外身。

〈其四〉楚地固多士,中知晉乏材。賢哉吳季子,聞樂辨興衰。

(絡緯吟 卷七)

⁸⁹ 喬玉鈺:〈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明清才女的皈依佛道之風〉,《古典文學知識》,2006年第二期,頁86-89。

⁹⁰ 見曼素恩:《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出版 2005年11月),第三章與第七章。

⁹¹ 參見王莉芳、趙義山:〈晚明女曲家徐媛初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7月,第四期,頁92。

⁹² 見(明)盧熊撰《蘇州府志》卷八十一,人物八,范允臨,頁1974。收於《中國方志叢書》,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出版。

〈其三〉這首詩中，徐媛似乎對於因果論頗為認同，毋須執著於身外之物，內心才得平靜，明顯有著禪意。不過在詩中她卻又引用了楚材晉用的典故，暗喻夫婿的不被重用，似乎對於夫婿的遭遇也有著不滿的情緒。所以，徐媛的感概歸隱實是矛盾而痛苦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嘆世歸隱的作品在她的散曲〈桂枝香·寒夜書愁三首〉之三中更加明確的被點出：

俗情已掃，生緣未了，沒來由兩字功名，縈絆我一生潦倒。……何日遂皈
依真誥，及早去脫塵囂。回首青山近，仙娃拂袖招。

另一篇套曲作品〈感懷追逝〉中表現的更加明確清晰，開頭即說：⁹³

〈北新水令〉一番塵話夢栩栩，空勞了半生心跡。當日個帝城春色滿，今日個故國冷烟迷。浮名似片瓦飛飛，浮名似片瓦飛飛，怎如那巢雲的伴孤松在萬山深處。……〈尾聲〉蠅頭蝸角誠虛器，瓦沈上黃梁一覺起，從今後門鎖蒼苔護紫泥。

既感概現實，也追懷歷史，對世事虛幻、是非混淆的喟嘆，再追懷往日，別離愁緒無盡，最後轉而描繪隱逸生活。是喟嘆、是傷懷、也是無奈。整篇作品宛如徐媛個人心路歷程的描繪，明顯看出她心境上的轉變。

在曼素恩的研究中提到女性菁英的生命歷程，在生育終點的人生轉捩點(五十歲)往往會退回私室持珠念經，朝向佛或道的精神境界。⁹⁴徐媛的晚年似乎也走向了依託宗教的路子，儘管作品數量較少，但亦保留了幾篇感仙悟道的宗教作品。如在〈行清溪洞有感三首〉中即提到「六劫塵中度歲華，三途苦海寄生涯。若從心境窺塵境，無碍心中見佛牙。」透露了她的宗教觀。在另一首〈寫懷〉中，

⁹³ 以上所引之徐媛曲作皆出自《絡緯吟》第十卷，《四庫未收書輯刊》第柒輯 1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⁹⁴ 相關論述見曼素恩：《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出版 2005年11月)，第三章與第七章。

所展現出來的是一幅自適的景象：

生平慕玄素，結想在煙霞。鳴琴坐幽石，閑情撫落花。

飛鳥自來去，白雲任紛挐。內志既已適，浮沉安足嗟。(絡緯吟 卷四)

徐媛在此時已想要過著歸隱山林、閒雲野鶴的生活，鳴琴賞花，不爭世事。「內志既已適」指的應該就是她的心靈依託已得安適之所，當內心已經找到適當的位置，何必管他塵世的浮沉，此時徐媛的心態已寧靜許多！⁹⁵

而徐媛的悟道歷程，在面對至親的死別上特別彰顯出來，徐媛將內心的悲傷用〈夢中聞亡親栽蓮感大士作〉⁹⁶五首來撫慰心靈的傷口，在痛徹心扉之後，徐媛的心靈得到了救贖：

〈其四〉真觀非自觀，禪定復觀禪。但作禪觀義，空觀是法觀。

〈其五〉苦海成航海，靈空本係空。偶因空外想，空外竟無窮。

人生是苦海，要能大徹大悟方能脫離苦海的輪迴。徐媛在父母亡故之後更對宗教的禪意有所體會，萬事萬物皆是空，只有不執著於人生的苦，完全的放下我執，才能了悟空的境界，也才能見到空外的無窮境界，脫離人生的苦痛。徐媛的感仙之作，充滿了佛的禪意，是解脫也是曠達。

此外在〈復作大士頌〉⁹⁷中，徐媛將對心靈的修行與對西方極樂世界的嚮往書成篇章：

空劫認非空，薰聞香即戒。常以靜觀心，見彼莊嚴態。覺性自圓妙，生滅及住在。滅盡已滅因，本始詎違邁。既悟昔往根，復感生生派。願垂廣濟功，同上蓮花界。

⁹⁵ 以上所列兩首詩作可能非徐媛晚年的作品，但因已呈現出她的宗教觀雛形，故選列之。

⁹⁶ 《絡緯吟》卷七：頁 358-359。

⁹⁷ 《絡緯吟》卷十一：頁 400。

由詩句中看的出來此時徐媛可能已經退居私室禮佛多時，對於大士的莊嚴景仰與對登上蓮花界的嚮往，都充分表達出詩人修行的圓融與心境的安寧，此時世事的變遷、人世的浮沉對詩人來說已無太大意義，詩人已從宗教的投入得到心靈的救贖。

總之，徐媛多病的童年，不斷充實智識的新婚日子，與丈夫四處宦遊寫作，娛樂唱酬，到晚年潛心向佛，恬淡修行安度晚年，精采豐富的一生，在生活無虞且在丈夫支持下，讓她無牽無掛，在文學的花園裡盡情暢遊著，無怪乎李聖華先生在《晚明詩歌研究》中說徐、陸是晚明時期動盪年代裡幸福的女作家⁹⁸。

⁹⁸ 李聖華先生認為晚明後期的女作家多遭改朝換代之痛，而吳中二大家至少擁有較為安定的生活，故其認為徐、陸比起當代女作家是幸福許多的。見《晚明詩歌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10月，頁347。